

假左派 真右派

揭批“四人帮”文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

假左派 真右派
揭批“四人帮”文集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肥西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frac{5}{8}$ 字数：74,000

1977年4月第1版

197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3102·516 定价：0.21元

目 录

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红旗》杂志评论员(1)

假左派 真右派.....任 竹(6)

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党、瓦解党的罪行.....钟佐文(13)

反革命的老调新唱

——揭穿“四人帮”掀“军内资产阶级”的阴谋

.....解 正(22)

“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背叛

.....北京师范大学理论组(30)

“四人帮”篡改接班人五条是为了结帮篡党

.....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批判组(39)

张春桥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死敌.....农林部大批判组(45)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村一场深刻革命

——批判“四人帮”打着革命化的幌子否定机械化的

罪行.....第一机械工业部大批判组(53)

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

.....教育部大批判组(61)

围绕鲁迅著作出版问题的一场搏斗

——揭露“四人帮”破坏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罪行

.....国家出版局大批判组(74)

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

——揭发、批判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篡党夺权

舆论工具的罪行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84)

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批判组(93)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 教育部大批判组(100)

斩断“四人帮”伸向体育战线的黑手

..... 国家体委大批判组(107)

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 人民战争

《红旗》杂志评论员

深入开展揭批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今年的中心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三个多月来，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亿万人民同仇敌忾，挥戈上阵，掀起了一个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自满，还要继续努力作战。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华主席指出：“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四人帮”是一伙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根本目的的反革命黑帮；是一伙对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极右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路线，集中代表了这一切反动阶级的反革命利益和愿望，是一条极

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是敌我矛盾问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四人帮”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多年，他们长期控制舆论阵地，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是正确的。他们反革命黑手到处伸，修正主义毒菌四处散，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革命到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在一些他们严密控制的地区和单位，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流毒很广很深。对此，我们决不能轻视，决不能低估。如果我们不花气力把“四人帮”揭深批透，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算，那么，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就不能肃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很好贯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就不能顺利执行，大治天下的战略部署就不能很好落实，已经取得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目前，全国各地深受“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扬眉吐气，斗志高昂，积极同“四人帮”作斗争，运动发展迅速，形势很好。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有的地方和单位还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的现象，也有的地方和单位满足于前一段运动的成绩，没有注意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推向前进。因此，当前迫切需

要的是：加强领导，把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够，认为“四人帮”已经打倒在地了，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极端孤立，再也兴不起风浪来了；也有的同志对于“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造成的毒害估计不足，简单从事，满足于一般的揭批，而没有下功夫把他们批深批透，甚至认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累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已经“不批自臭”的了，不必再去动脑筋、花大气力了。这种种麻痹轻敌思想是很有害的。揪出“四人帮”，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四人帮”及其不肯改悔的死党，虽然只是极小的一小撮，但如果不查清他们的罪行，同他们进行严肃坚决的斗争，他们一有机会，又会兴风作浪。特别是“四人帮”长期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散布大量的修正主义谬论，把许多问题的是非搞乱了。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的谬论，分清是非，澄清人们的思想，这不是一般的批驳就可以办到的，而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扎扎实实地一条一条地进行揭批。如果不把他们的反革命画皮和修正主义谬论揭深批透，就不能取得运动的彻底胜利。

当前要把斗争引向深入，关键在领导。各级领导要响应党中央的战斗号召，进一步提高对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的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带领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斗争中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果断，对阶级敌人绝不当东郭先生，心慈手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有的领导干部由于受“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应该放下包袱，同群众一起积极参加战斗，在清算“四人帮”的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

划清界限，总结经验教训。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各级领导都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抓好典型，推动一般。要注意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把打击面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对他们也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和严肃的斗争，促其把参与阴谋活动的那一套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更要着重于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要把揭批“四人帮”这样一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从各级领导机关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发动起来。要运用各种舆论工具，采取各种批判形式，向“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发动一场全面总反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仅具有识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敏锐眼力，而且具有斗倒他们、批倒他们的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揭批“四人帮”以来，广大群众义愤填膺，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革命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既批了“四人帮”，又教育了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要总结经验，积极引导，把群众性的揭批搞得更深入、更好，依靠群众自己来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对付打着马克思主义

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四人帮”，更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前，特别要认真学好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革命批判武器，来拆穿他们的西洋镜，战胜他们的诡计。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他们的谬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得象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臭不可闻，使它们在我们党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没有任何市场。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辉煌的战果，只要我们不骄不躁，齐心协力，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彻底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二期）

假左派 真右派

任 竹

王张江姚“四人帮”，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

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以斩钉截铁的语言，明确指出：“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这个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出的科学结论，揭示了“四人帮”的反动本质，剥去了他们的伪装，还了这伙极右派以本来的面目。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左和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区分左派和右派，要看他们推行什么政治路线，代表什么阶级，对历史发展起什么作用。你推行革命路线，代表先进阶级，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你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是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右在哪里？正如华国锋主席所说：“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丧心病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搞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混淆了革命的动力和对象。这些自封为“左派”的先生们，张口“革命”，闭口“阶级斗争”，他们究竟是在“革”谁的“命”，他们的“斗争”矛头指向哪个阶级？

“四人帮”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作他们的“革命”对象。真正的走资派要不要反呢？当然要反，过去反过，今后还要反。但是，“四人帮”竭力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否定“三要三不要”是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炮制了一套极端荒谬的理论：一曰，老干部基本上都是走资派；二曰，“走资派遍地走”，多得不得了；三曰，凡走资派都是反革命。他们对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一律戴上“走资派”的帽子，统统都要打倒，穷凶极恶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人民解放军。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猖狂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把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恶毒污蔑为什么“现代的儒”、“现代的宋江”，明枪暗箭，诽谤诬告，无所不用其极，必欲打倒而后快。他们咒骂我军的老师是什么“黑司令”、“大军阀”、“黑大炮”、“土匪”，等等。几十年来，一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竟然任意糟踏。过去蒋介石重金悬赏捉拿不到，国民党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

的革命英雄，“四人帮”却都要置之死地。这伙反共分子，真是做了国民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啊！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提出揪“党内资产阶级”，整“戴红领章、红五星的走资派”的反动口号，把黑手伸向军队，又是要“放火烧荒”，又是要“用炸弹炸”。好家伙！大有摧毁钢铁长城之势，真是跳蚤推山，太不自量。王张江姚一伙不是叫嚷什么要“动大手术”吗？他们就是这样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人民军队，“动”着剖腹挖心的“大手术”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四人帮”这伙货真价实的走资派，打着“反对走资派”的大旗，包住自己，打击别人，真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他们哪里是要反对什么走资派，而是要陷害革命派。如果他们不是极右派，不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怎么会对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人民军队怀有如此刻骨的仇恨，怎么会把我们的革命领导干部当作“革命”对象，疯狂地加以迫害和打击呢？

“四人帮”打着“支持造反派”的旗号，把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当作他们的依靠力量。“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四人帮”讲的造反，是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把一切反动势力纠集起来，戴上“造反派”的桂冠，拼凑反革命的别动队。他们对那些忠实追随他们的、以“打倒一切”为己任的政治投机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视若明珠，竭力扶植。他们同那些盗窃国库的能手，贪污腐化的败类，搞打砸抢的亡命徒，相依为命，沆瀣一气。他们跟那些行凶作恶、危害社会秩序的骗子、流

氓、阿飞等社会渣滓，打得火热，称兄道弟。他们收罗地痞控制一些工矿企业，利用文痞操纵舆论工具。臭名昭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张铁生，就是他们那个别动队中的“明星”。“四人帮”不依靠工人阶级，不依靠贫下中农，对于真正的革命动力人民群众则极端仇视，想方设法打击之，分裂之。那个妄想当“女皇”的江青，不是就把革命群众污蔑为“不革命”的，狂叫什么“不革命的走开”么，妄图把人民群众赶出革命的大门之外。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在人民内部制造分裂，挑动这一部分群众和另一部分群众誓不两立，你斗我，我斗你，各以自己的阶级兄弟为“革命”对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他们不是极右派，不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怎么会和牛鬼蛇神一鼻孔出气，充当他们的挂帅人物呢？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四人帮”正是在这个首要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所以要推行这样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他们的“帮”天下。哪有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左派”，哪有这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派”？！华主席指出的“人们这几年总是在想”的十二个“为什么”，雄辩地证明：“四人帮”确实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路线确实是右得不能再右了。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四人帮”不是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吗？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一般的事实。他们那个“帮”，是完

全站在革命人民对立面的，是完全站在反动阶级那一边的。人民拥护的，他们视为仇敌，我们的痛疽，他们当作宝贝。他们那个“帮”，代表着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利益，反映了国内外反动阶级的复辟愿望。他们讲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他们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叫做专无产阶级的政，或曰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一位外国朋友说：“不可想象，左派的政策会违反人民的利益？也正如不可想象，革命会革到人民头上，无产阶级专政会专无产阶级的政一样”。这话说得何等好啊！

搞修正主义的极右派，必然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四人帮”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正是反动派的角色，他们的路线是复辟倒退的路线。

“四人帮”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反复辟倒退”的英雄好汉，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两块金字招牌：一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支持者”，一为“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者”。你看，这还不是“促进派”！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们或者是贪天之功，窃为己有，或者借口求全责备，任意扼杀，或者是借新事物之体，还旧事物之魂。对于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拚命强化之，大搞其特权，真是爱得深，搞得凶，比资本家还厉害。尽管他们装腔作势，激昂慷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是，明白底细的人谁也不信那一套。什么“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支持者”，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者”，统统是骗人的。

“四人帮”是一伙促退专家，破坏能手。他们的“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就是以捣乱破坏为唯一职责的。他们乱党，乱军，乱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破坏革命，破坏

生产。他们疯狂摧残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反对“大干社会主义”，要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江山弄成个稀巴烂；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搞得你“颗粒无收”，“没有文化”。他们的“激进”，就是要“激进”到八亿人民没得饭吃，没得衣穿，没得戏看。如此“激进”，岂非咄咄怪事。要说“激”，他们是有的，而且确实激烈得可以。至于说“进”，那就颠倒了，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我国历史就会出现大倒退，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光明的中国就会变成黑暗的中国。给这样的反动派按上“激进派”的雅号，合适吗？太不合适了，因为名不副实。要做到名副其实，还是称之为“激退派”即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为好。

“四人帮”之所以是极右派，反动派，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他们本来就是国民党营垒中的人物，是蒋家王朝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曾化名“狄克”围攻鲁迅。他用这个洋名，是有深意的。“狄克”者，其义有二：一为dick，即侦探也；二为dictatorship，即专政也。张春桥、江青之流，当时就是从狗洞里爬出来，充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侦探”，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充当帝修反的“侦探”，要对新中国的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王洪文是可耻的工贼，新生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姚文元是黑帮文霸，阶级异己分子。弄清“四人帮”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肮脏的政治生涯，揭露这伙新老反革命的真面目，就可以懂得他们为什么如此疯狂地反共反人民了。

“四人帮”的暴露，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他们本来极右，却又装出一副唯我最“左”、唯我最“激进”的模样，招摇撞骗，欺世盗名。反派人物，演起正面角色来，总是不大象，漏洞很多，破绽百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通过现象看本质，对他们极右派的嘴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伙开历史倒车的极右派，不是老爱骂别人为“辫子党”吗？其实，他们自己才是一伙把辫子盘在头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做着“改朝换代”迷梦的复辟党。只要摘去他们紧紧戴在头上的红帽子，再查一查他们的来龙去脉，人们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那又粗又长的极右派“辫子”了。

（原载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

彻底清算“四人帮” 破坏党、瓦解党的罪行

钟佐文

半个多世纪以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伙钻进党内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大搞结帮营私，结帮篡党，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性质，使之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为了消除“四人帮”对党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危害，我们必须彻底清算他们破坏党、瓦解党的反革命罪行。

大刮立党为私的邪风， 妄图改变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每个党员必须“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决不能为剥削阶级为少数人谋私利。这个立党为公的建党宗

旨，明确载入了我们党的章程，充分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全部革命实践中。几十年来，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这是我们党所以得到亿万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重要原因。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正是在这个关系到党的性质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之间展开了根本对立的尖锐斗争。

“四人帮”彻底背叛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肆意践踏立党为公的原则，大搞立党为私。他们挂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谋的是一己一帮的私利，代表的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利用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人民死活，侵吞工农群众的劳动果实，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干尽了坏事，完全是一帮“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吸血鬼，是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他们利欲熏心，权迷心窍，贪得无厌，恨不得把党和无产阶级的一切权力都一口吞下去。他们出于篡权复辟的需要，在党内刮起了一股唯名是争、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邪风。他们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和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当作商品和资本，用以收买亲信，网罗党羽。对于那些削尖脑袋“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的人，只要能替他们那个反革命黑帮卖命，就送“党票”，给“官”做，封高位，授重权。在“四人帮”的煽动和庇护下，一些人公开叫喊什么“造反不当官，等于白造反；当官不入党，有权

也难掌”，“入党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身上”，伸手向党和人民要官要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四人帮”严密控制和插手破坏的极少数地方和单位，这种立党为私的反动思想，严重地侵袭了党的肌体，腐蚀了党员的思想，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甚至造成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地富反坏猖獗，资本主义泛滥的严重恶果。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听任“四人帮”刮起的立党为私的邪风发展下去，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四人帮”疯狂反对立党为公的原则，受到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抵制。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永远坚持立党为公的原则，坚决捍卫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招降纳叛，拼凑 篡党夺权的黑班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我党的历史上，凡是要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从王明、张国焘到刘少奇、林彪，没有一个不是任人唯亲，招降纳叛的。“四人帮”比起他们的“先辈”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极力反对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培植亲信和死党，网罗牛鬼蛇神，拼凑篡

党夺权的黑班底。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使用了明的一手和暗的一手。明的一手是，打着所谓支持“造反派”、“反潮流战士”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翁森鹤、张铁生之类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统统网罗在他们的反党黑旗之下，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暗的一手是，他们曾经一再指使其亲信，要按照所谓“领导熟悉”、“群众拥护”、“有感情”等条件选人用人。他们这个标准中的所谓“领导熟悉”，就是“四人帮”所熟悉的死心塌地追随他们的走卒；所谓“群众拥护”，就是为他们那一帮一派所拥护；所谓“有感情”，就是有跟着“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感情。他们还布置其亲信，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覆”。王洪文甚至提出要象林彪培植死党周宇驰、于新野那样精心培植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凡是为“四人帮”忠实效劳的人，从政治流氓到反动文痞，从叛徒特务到地富反坏，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他们全都当作宝贝，扶其青云直上。“四人帮”在一个地方培植的几个所谓“虎将”，就是他们这条用人路线的活标本。这几个“虎将”，有的是参加过反革命集团，曾经企图叛国投敌，后来冒充“造反派”而崭露头角的“阿飞司令”；有的是勾结资本家开过地下工厂，贩卖黄金，盗窃国家大量资财的新生产阶级分子；有的是靠打砸抢起家，横行霸道，欺压群众，腐化堕落，流氓成性的坏分子。就是这样一伙人，却被“四人帮”吹捧为“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力量”，塞进了领导班子。

“四人帮”为了结帮篡党，还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一再刮起“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双突”歪风。

他们根本无视党规党法，肆意破坏党管干部的原则，大搞指名入党，限期提干。本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就为其编造假材料，欺骗党内外群众。本人所在支部通不过，就利用职权，拿到外单位支部或另立一个临时支部通过，搞所谓的“飞过海”入党。有的人还不是党员，就提前给戴上“书记”、“委员”的桂冠。谁反对这一套，他们就反诬你“压制新生力量”，把你当作“石头”搬掉。在“四人帮”支持下，有的人甚至持枪弄刀，要挟党委，威胁群众，强迫纳新、提干，还得意忘形地说什么这是“枪杆子里面出党员”，激起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无比义愤。

我们要深揭猛批“四人帮”招降纳叛的罪行。“四人帮”这种在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胡作非为，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钻进领导班子，给某些党组织带来了思想、组织、作风的严重不纯。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对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地、坚决地、审慎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特别警惕阶级敌人钻到党内特别是领导班子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党。发展党员一定要坚持党章规定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标准，提拔干部必须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办事，以维护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疯狂迫害革命干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有力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

鲜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几十年来，他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又涌现了一大批符合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他们朝气蓬勃，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这些革命的新老干部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看成他们篡权复辟的极大障碍，要统统打倒，置之于死地，由他们的死党和亲信取而代之。他们蓄意歪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大造“老干部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之类的反革命舆论，妄图把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忠心耿耿为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政军领导骨干打成“革命”对象。对于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青年同志，他们也是不择手段地加以镇压和迫害。他们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或者无中生有，颠倒黑白，造谣中伤，捏造罪名，陷害革命同志。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他们还磨刀霍霍，杀气腾腾，赤裸裸地提出了“杀人”计划。甚至连平时装得“道貌岸然”的反动文痞姚文元也狂叫“要枪毙一批”，把枪口对准了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劳动人民。如果“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得逞，无数革命同志就要被浸入血泊之中。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搞得民怨沸腾。他们严重破坏了我们党内斗争的准则和党的优良传统，在党内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爱护干部，总是一再强调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对于犯了错

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一要看，二要帮”，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对于那些颠倒敌我关系，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为，我们党历来都是不容许的。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把他们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过来，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使我们党更加兴旺发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大搞派别阴谋活动， 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四人帮”在党内自成体系，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大搞党中之党，以“帮”代党，另搞一套，妄图指挥一切，组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破坏在党内不准组织派别和秘密集团的党规党法，四处私设秘密联络点，窝藏坏人，私整黑材料，进行分裂党、瓦解党的罪恶活动。他们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公然鼓吹“现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走资派网”，狂叫要“揪一层”、“层层揪”，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动大手术”。他们到处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在人民内部制造分裂，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在他们的毒害下，有的人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成了“派员”，有话不在党内讲，有问题不在党的领导下解决，有的党委成员把派的利益看得高于党的

利益，里通山头，听派的指挥，在党内搞宗派，闹分裂。“四人帮”的这些罪行，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了党的纪律，破坏了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决同一切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四人帮”结帮篡党的罪行对党的肌体和党员的思想腐蚀极大，对党的战斗力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害很深。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党员中进行广泛的教育，使大家真正懂得‘四人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造成的危害的严重性，懂得立党为公、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允许结帮营私这个基本的道理，懂得党内不允许组织派别和秘密集团这条党规党法，懂得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以及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懂得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懂得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允许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官要权，懂得共产党员必须遵守‘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做到党章规定的五项基本要求。要把‘四人帮’结帮营私、结帮篡党那一套，批得臭不可闻，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从而彻底清除它的影响，使它在党内没有市场。”

我们党同“四人帮”在党的建设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建

党路线还是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是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还是使党蜕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党经受住了新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的党更加团结坚强，更加受到亿万革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任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要想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

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并提出在今年适当时机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党整风运动，这是完全符合我党三千多万党员和全国亿万人民共同心愿的英明决策。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批判“四人帮”结帮营私、结帮篡党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努力把各级党组织都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更好地肩负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原载一九七七年第二期《红旗》杂志）

反革命的老调新唱

——揭穿“四人帮”掀“军内
资产阶级”的阴谋

解 正

在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精心策划下，一个蛊惑人心的反动口号被抛出来了，叫做掀“军内资产阶级”。它贴着一九七六年制的标签，其实，人们很清楚，不过是一九六七年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掀军内一小撮”的再版，是反革命的老调新唱。

“四人帮”反军乱军是一贯的，野心越来越大，阴谋越来越毒。他们的手法则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这一次，他们公然歪曲、篡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炮制出掀“军内资产阶级”这个反动口号，其目的就是要掀起新的反军乱军恶浪，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革命领导干部，篡夺军权，毁我长城。这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大步骤。

一九七六年一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这对朝思暮想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是当头一棒。张春桥象一只疯狗跳将起来，在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的当天，写下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黑文，发泄

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发誓要把华国锋同志整掉。接着，张春桥、江青就和他的亲信密谋策划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鼓吹要写“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典型”，“要写到中央，纳入大的斗争”。“四人帮”借“走资派”问题大作文章，在各个领域大造反革命舆论，就是为了“掀一层”、“层层掀”，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掀“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脱笼而出了。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春桥对他们在上海的亲信面授机宜说，“对部队我们有批林批孔的经验”。什么“经验”呢？说穿了，就是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把攻击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叶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擅自在部队发动政治运动，把部队搞乱。张春桥的黑话，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们反党乱军、掀“军内资产阶级”的罪恶阴谋。

不久，那个传播白骨精江青“三·五讲话”而颇受“四人帮”赏识的政治小丑，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又一次跳出来充当急先锋。他利用职权，从这个部队窜到那个部队，开了这个会又开那个会，鼓其如簧之舌，喋喋不休地叫嚷写“军内资产阶级”、“戴红领章、红五星的走资派”，说什么写好“同军内走资派的斗争”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我们肩上了”，等等。他越讲越起劲，越讲越露骨，竟然狂吠：军内“确实有几个走资派在那里摆着，都是大家伙”，这是“你死我活的、尖锐的斗争”，“不冒点风险也是不可能的”。这个在主子面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人物，此时却如此凶恨，杀气腾腾，毫无顾忌，到处挥舞掀“军内资产阶级”的大棒。显然，他们利令智昏，头脑发胀，急不可待地向军

队动手了。

“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鼓吹“军内资产阶级”层层都有，“大家伙有，小家伙也有”，要统统打掉。他们特别把矛头指向军委领导同志，指向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他们肆意诋毁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胡说“小小长征算了什么”，“老师”、“战将”“有什么了不起”，任意扣上“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等帽子，加以打击陷害。白骨精江青恶狠狠地叫嚣，她是能“吃掉老师”的“过河卒子”。他们打着“联系实际”的幌子，煽动联系“上面的”，抓住“幕后的”，“要敢动庞然大物”，大抓所谓“代理人”。什么“联系实际”？不过是“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一句话，就是把你打倒，让他上台。

到了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猖狂地四面奔走，八方串连，揪“军内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也达到了高潮。七月，王洪文亲自出场，赤裸裸地胡说，军队“主要问题在上面”，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八月，张春桥、姚文元给他们的亲信下达黑指示，要求“紧急动员”，“集中全力”，提前编辑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并且要着重写赫鲁晓夫怎样作秘密报告，怎样与朱可夫一起搞军事政变等内容，丧心病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华主席、叶副主席。

就在这个期间，“四人帮”一面指使其亲信开黑会、写黑戏、派人游说等，从上而下地把揪“军内资产阶级”这股妖风吹向全军；一面又采取送“材料”、传“经验”、造谣言、搞单线联系等卑劣手段，点火于基层。一九七六年六月间，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就强令个别基层单位讨论所谓“军内资产阶级”问题。对他们的那一套，部队党委和干部战士强烈反对，责问他们“这样搞，不是同林贼的揪军内一小撮一样了吗？”八月十三日，“四人帮”在上海的那几个亲信合伙窜到这个单位，气势汹汹地声称：讨论这个问题“有极大的尖锐性”，“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对今后长远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们捉刀代笔，盗用党支部名义给王洪文、张春桥上书言事，说什么对“军内资产阶级”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下决心严肃解决”。他们在军队煽动极端民主化，极其荒谬地提出了什么“上调查”、“倒蹲点”，妄图唆使干部战士到上级机关调查“军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把不革命的、军内走资派揪出来”。他们还强行推广所谓讨论“军内资产阶级”的“经验”，妄图从此突破，搞乱全军。

也是在八月十三日，“四人帮”精心豢养的那个“白卷”走狗、反革命分子张铁生，钻到部队的一个单位，大放厥词。他歇斯底里地嚎叫：“党内有路线斗争，有资产阶级，军队更是如此”。他用“大官老爷”、“二老爷”、“三老爷”、“旧军阀”、“官僚”、“疯狗”、“恶狼”、“比地主还厉害”、“雇佣军或者是一个御用军队”等恶毒语言，肆意诬蔑攻击人民解放军，辱骂我军干部，指名道姓地攻击军委领导同志。这个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真是难得的反面教员。他的丑恶表演能够使人们一目了然地看清楚，“四人帮”及其死党是怎样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杀向人民解放军的，看清楚他们鼓吹揪“军内资产阶级”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

九月中旬，“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亲信，竟然秘密串连军队的个别人，策划召开所谓“反潮流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所谓“开门建军”问题，密谋从上到下、里应外合地揪“军内资产阶级”。

“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上下配合，南北呼应，内外串通，一致行动，恨不得把军队领导权一把夺过去，把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一口吞掉。大量事实证明，他们炮制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

马克思在揭露巴枯宁时说过：“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四人帮”在理论上极端荒谬、一窍不通，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却是专家、能手，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老祖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还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给我们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只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手里，才有可能防止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才有可能率领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和

“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正是解决这样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极端重要问题的强大武器。它的锋芒所向、斗争重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对着“四人帮”这类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这类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刘少奇、林彪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正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揭露“四人帮”时指出：“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炮制出所谓揪“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转移斗争大方向，则完全是个阴谋，是“贼喊捉贼”，是妄图打倒我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军权，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同时，又可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逃脱人民的惩罚，一箭双雕，用心何其险恶！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军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好的，历来是好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军队稳定，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我们这个军队决不可以削弱，更不可以搞乱。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强调这点。一九七六年春，遵照毛主席关于不要冲击军队的指示，党中央、中央军委明确规定，要保持部队的稳定。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公开和毛主席、党中央、中

中央军委“对着干”，唯恐军队不乱，抛出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这就再一次说明，他们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死敌。他们的一个亲信毫不隐讳地说：“什么会不会搞乱军队？”“什么军队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大叫大嚷要破“军队特殊论”。而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保持军队的稳定，保持军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保证我军坚强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如果说特殊，那末这种特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我军所肩负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毛主席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无论从国内或国际的阶级斗争现实来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务必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这支强大的军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现在妄想搞垮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在国内是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四人帮”疯狂地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正是代表了党内外、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利益和愿望。因此，爱护还是破坏人民解放军，是区别敌我的重要标志。总而言之，只要阶级、阶级斗争存在，只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解放军，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爱护，不能搞乱。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四人帮”揪“军内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同“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活动一样，也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功夫，

就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烟消火灭了。这固然出于“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的意料之外，却完全是在人民的意料之中。原因是：“四人帮”反军乱军，违背民心、党心、军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四人帮”妄图搞乱军队，然而事与愿违，到头来，反而乱了他们自己，一个个落进了自己掘好的坟墓里。而我们这支百战百胜的人民军队，却经受了锻炼，更加坚强了。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

“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 指示的背叛

北京师范大学理论组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他的晚年以更大的精力研究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根本问题，领导全党同党内的走资派，同新老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和勇敢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和丰富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遗产。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发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就是其中十分光辉的篇章。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根源，再一次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鲜明地尖锐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把革命锋芒直指林彪一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为我们的反修防修斗争指明了方向。今天，在华主席率领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我们重温毛主席这一指示，更深切地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发出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背景的。当时，正是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中央正在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乘机猖狂进行阴谋活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十月，他们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告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接着，江青又向毛主席伸出黑手公然为“四人帮”争权。毛主席早已看穿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两天以后，毛主席听取了周总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随即作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号召我们深入开展反修防修斗争，防止林彪一类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毛主席的指示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现在看得很清楚，“四人帮”正是地地道道的林彪一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就是直接针对他们的。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是我们批判“四人帮”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反修防修斗争的强大理论武器。

在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指引下，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理论，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增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自觉性，提高了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

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尤其重要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擦亮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眼睛，大大提高了对林彪一类的识别和抵制能力，从而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四人帮”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可耻叛徒。他们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野心，对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极端仇恨，肆意进行篡改；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十分恐惧，疯狂进行破坏。

毛主席的指示刚下达，他们就密谋策划，刮起了反经验主义的妖风，妄图磨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锋芒，扭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革命方向。

十多年来，毛主席多次指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可是，“四人帮”同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大唱反调，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大做文章。姚文元首先发难，公然写文章鼓吹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接着，“四人帮”倾巢出动，又是做报告，又是发指示，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作为学习的“重点”。霎时间，大反经验主义的喧嚣声甚嚣尘上，妄图把群众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引入歧途。

“四人帮”掀起大反经验主义的恶浪，包藏着极其险恶

的祸心。列宁指出：“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四人帮”否认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就是要蒙蔽群众的眼睛，以便他们放手地搞修正主义。他们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同叛徒王明过去大批所谓“狭隘经验论”一样，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反对实践第一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否定我们党五十多年的斗争历史。他们的政治目的，是要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由他们取而代之。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指示又怕又恨，竟然千方百计地加以扣压、封锁和对抗。这就更加证明了他们反经验主义是假，搞修正主义是真。

“四人帮”对抗和歪曲毛主席的理论问题指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还表现在他们肆意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信口雌黄，制造混乱，大耍反革命两面派。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分析。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

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在这里既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又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历史的联系，明确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毛主席强调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就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四人帮”极力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把毛主席指示的丰富内容别有用心地归结为就是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他们不讲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可避免性和必须加以限制的辩证关系，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大肆鼓吹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一方面严重存在，那一方面占统治地位，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一革命原则弄得混乱不堪，搞乱了理论，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法权，如列宁所说，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毛主席也指出：“列宁说建设设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仅要承认它，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保障它。但是，承认和保障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承认和保障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制度，这就有可能导致扩大穷富差别和两极分化，成为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与条件。因此，

毛主席说“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为我们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必须加以限制，不允许扩大和强化，绝不能把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当作终极目标，把社会主义凝固化；另一方面，只能加以限制，而不能在一个早上就把它取消。至于怎样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当时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这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现了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

“四人帮”公然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肆意割裂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则，任意践踏社会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大肆鼓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需要物质和精神条件的谬论。他们讲限制是假，制造混乱是真，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丑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挑拨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他们拿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根大棒，到处打击干部和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谁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就说是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搞“管、卡、压”，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谁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就说是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甘当“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究竟怎样算“限制”，怎样算“扩大”，在“四人帮”那里毫无客观标准可言，一切以是否跟他们走为转移。顺从者一律封为“限制”的英雄，反对者统统加上“扩大和强化”的罪名。

大唱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调，不过是“四人帮”用来掩盖他们肆无忌惮地扩大特权的遮羞布。他们利用特权，拼命攫取商品和货币，大量侵吞和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其实，

他们早已不只是什么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巧取豪夺，贪污盗窃，恨不得把人民的全部财产一口吞下去。从他们对待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这种反革命两面派行为，从他们这种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剥削和掠夺人民血汗的行为，也充分说明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可耻叛徒。

“四人帮”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表现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混淆阶级阵线，极力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展了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而且特别要同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顽强的斗争。反修防修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防止林彪一类新老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上台。但是，张春桥却恶毒攻击毛主席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扬言要由他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真是狂妄、无耻到了极点。

“四人帮”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论断，捏造出一个“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

都不肯改悔”的反动公式，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搞乱阶级阵线。毛主席对党内走资派作了科学的分析，规定了明确的阶级含义。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就是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四人帮”对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讳莫如深，却另立标准，以帮划线，完全颠倒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他们把从中央到地方大批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忠心耿耿为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骨干，污蔑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一概打倒；另一方面，他们又抹杀“造反”、“反潮流”的阶级内容，把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封为“造反派”，把翁森鹤、张铁生一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捧作“反潮流”的英雄，用突击入党，突击升官的手法把他们拉入党内，窃据要职，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效劳。正如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指出的，“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两年来，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正确路线的代表”等一顶顶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竭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照妖镜下，还是无可逃遁地现出

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叛徒的原形。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对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作用。长期以来，“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散布了大量的毒素，搞乱了理论，搅乱了思想。这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要多看马列主义的书”，努力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要通过学习和批判，进一步认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阶级基础、极右实质和严重危害，深刻理解我们党这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四人帮”揭深揭透，批倒批臭，把他们歪曲、篡改、搞乱了的理论原则加以澄清，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肃清“四人帮”所散布的一切流毒。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公开发表已经两年了。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更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警惕和防止林彪一类上台，确实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实践毛主席的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一次伟大胜利。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光辉指示，永远照耀着我们胜利前进的征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

（原载一九七七年第二期《红旗》杂志）

“四人帮”篡改接班人五条 是为了结帮篡党

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竭力推行了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招降纳叛，结帮营私，结帮篡党。彻底揭发批判他们这方面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对于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好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进一步搞好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高度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当具有的政治品质和优良作风，只有坚持按这五项条件选拔干部，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四人帮”这伙由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无耻地以“当然接班人”自居，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又一件华丽的外衣。其实，我们只要用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同他们的言行稍加对照，他们便立即现了原形。

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而“四人帮”则肆意封锁、对抗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四人帮”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竭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专门为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服务，为帝修反服务。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王张江姚一伙拉行帮，搞分裂，耍阴谋，施诡计，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大搞特务活动，私整黑材料，企图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以便由他们取而代之。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而“四人帮”任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统一纪律，自成体系，另搞一套，专横跋扈，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自吹自擂，文过饰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生活上，完全搞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修正主义那一套，确实是腐朽透顶，反动之极。

“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本来就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走的是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

表。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就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为了结帮营私，结帮篡党，对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竭力反对，肆意篡改。他们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的亲信，指令要按照所谓“领导熟悉”、“群众拥护”、“有感情”这几条，作为他们选用“自己的人”的依据。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帮派标准。

什么“领导熟悉”！“四人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对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他们恨之入骨，是要统统打倒的。江青猖狂地叫嚣过：“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她的这个自白，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四人帮”所谓的“领导”，指的就是他们那一伙。他们所谓的“领导熟悉”，就是为“四人帮”所熟悉。他们正是从自己所熟悉、所器重的那些人当中，培植亲信，网罗党羽，把那些政治流氓、反动文痞、社会渣滓、牛鬼蛇神，统统搜罗在自己的反革命黑旗之下，处心积虑地拼凑篡党夺权的黑班底。

什么“群众拥护”！“四人帮”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是一伙同工农劳动群众处于尖锐阶级对立中的吸血鬼，他们怎么会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放在心上呢！王洪文曾经用他那特有的流氓语言，露骨地对他们的亲信说过：“群众都拥护的人，只能是‘老好人’、‘小绵羊’、‘中间派’”，是“派不上用场”的。真正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恰恰是“四人帮”所竭力反对的。亿万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四人帮”不是采用种种卑鄙伎俩，大肆诬蔑，疯狂陷害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亿万人民无限信赖的华主席，“四人帮”不是横加诋毁，拚命攻击么！大批忠诚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党政

军领导同志，“四人帮”不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加以种种罪名，恨不得统统一棍子打死么！相反，对于依仗“四人帮”的权势，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民怨沸腾的死党和亲信，王张江姚不是当作宝贝，赐以高位，委以重权，赠以厚禄么！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所谓的“群众拥护”，根本不是广大工农群众拥护，而只是为“四人帮”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所拥护。

什么“有感情”！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懂得，“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的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四人帮”的嬉笑怒骂，一言一行，都鲜明地表现了极其反动的阶级感情。他们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们的党，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有的只是仇恨。“四人帮”正是从这种反革命的感情出发，选拔和重用对他们有感情的人。凡是给“四人帮”搞情报，写黑信，忠实效劳，百般献媚的人，他们就称兄道弟，亲如一家，授以种种桂冠，扶其青云直上，鸡犬升天；反之，凡是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就一概斥之为“复辟派”、“投降派”、“没感情”，捏造罪名，排挤打击，横加迫害。他们所谓的“有感情”究竟是什么货色，还不是一清二楚吗！

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四人帮”抛出的所谓用人“标准”，就是一条最典型不过的任人唯亲、招降纳叛的路线。联系到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凡是妄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没有一个在组织上不是竭力推行这

条反动路线的。从王明、张国焘到刘少奇、林彪，都是这样。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在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极为孤立，除了任用少数亲信和死党之外，是没有什么人会跟着他们跑的，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

“四人帮”肆意篡改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还无耻地吹嘘自己如何“爱护”、“关心”青年干部。实际上，他们正是腐蚀毒害广大青年和青年干部的罪魁祸首。他们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承袭并且大大发展了刘少奇“入党做官”和林彪“诱以官、禄、德”的反动腐朽思想。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引诱和鼓励一些人写一本书，演一出戏，唱一支歌，甚至给他们写一封表示效忠的信，就使之成名成家，升官发财。他们慷国家之慨，挥金如土，请客送礼，接见照相，拉拉扯扯，甚至弄虚作假，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捉笔代庖，伪造假答卷，使之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一面对青年干部进行拉拢和腐蚀，一面又把革命的老干部统统诬蔑为“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搞修正主义的老家伙”，蓄意制造新老干部的对立，搞垮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既打击老干部，又损害中年和青年干部。“四人帮”搞的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当年钻进布尔什维克党的奸细托洛茨基，趁列宁卧病不起的时刻，对党发动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挑拨党内新老干部的关系。他对青年阿谀奉承，称他们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时又说十月革命时期的老近卫军在蜕化。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托洛茨基是“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同党的

老干部对立起来”，“企图通过叫喊党在蜕化来掩盖他自己的蜕化和他自己的反党阴谋”。虽然时隔五十余年，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反党行径同托洛茨基的反党行径却是如此地相似，这就证明“四人帮”同托洛茨基是一丘之貉。他们手法一样，都是一打一拉；根本目的相同，都是篡党夺权；结果也完全一样，都落得一个最可耻的下场。

随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彻底垮台，随着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揭露和批判，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事业，必将得到进一步实现；符合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必将得到进一步爱护和支持；各级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让我们满怀胜利的信心，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吧！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日《光明日报》）

张春桥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死敌

农林部大批判组

“四人帮”是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复辟帮，也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害人帮。一九七五年以来，围绕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倾巢出动，那个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更是凶相毕露，或秘密策划，或猖狂叫嚣，一心想砍倒大寨红旗，妄图阻挡运动的前进，破坏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一个罪证

大寨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兴起，已经成为农村中极其广泛、深刻的革命群众运动，促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到了普及大寨县的新阶段。一九七五年九月，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报告，发

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伟大号召。亿万农民和各行各业，立即发起了向普及大寨县目标前进的大进军。全国农村的革命和生产生气勃勃，形势喜人。

可是，张春桥对这一运动极端仇视，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疯狂进行破坏。他根本不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放在眼里。上海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多次提出要到大寨参观学习，张春桥竟恶狠狠的叫嚷“自己搞嘛！为什么要学人家的？”他们对基层干部学习大寨的强烈愿望横加压制。有时也安排一些人去大寨参观，但这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张春桥的一个亲信讲得很清楚：“你们还是去吧！这是农林部安排的，不去，又要给人家捞稻草了。”看！在张春桥一伙眼里，“我们”和“他们”、“自己”和“人家”是何等泾渭分明！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敌对情绪，也更充分暴露了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动嘴脸。

他们不让学大寨，叫嚷“自己搞”，就是要树立他们自己的旗帜，和大寨唱对台戏。张春桥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扬言，他们把持的那个地区要“为全国和全世界作出样子”。一九七四年，他再次提出那个地区要“成为全国农业的样板，让全世界人民看一看社会主义农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交口赞誉的大寨红旗竟然不算社会主义农业的样板，非要他去另立样板不可，真是疯狂到了极点。

张春桥为了另树他们的典型，千方百计地要砍倒大寨这面红旗，把大寨贬低为一个普通的山区生产典型。他胡说什么“大寨是劈山造田，我们上海无山可劈”。他们散布“深

挖沟，广积肥，园田化，就是学大寨”的谬论；攻击大寨提出的“大批促大干，大干出大变”等革命口号是“反动口号”，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大野心家江青更是恶毒攻击大寨“受了修正主义影响”，“听修正主义的”。他们这样大肆鼓噪，就是要把大寨打成修正主义的黑旗，妄图搅乱人们的思想，想把广大贫下中农引入歧途。

张春桥的野心并不到此为止，他还狂妄地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革命的指导者。他恶毒攻击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著作，说看了以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还是不甚了了”。他授意要搞一个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作为今后制订政策的依据”，明目张胆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他还派人到农村搜集材料，迫不及待地要出一本象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那样的书，并由他来写序言，加按语，要“站得高，口气大，有哲理，居高临下”。这就是说要由他来充当农村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了，真是反动透顶。他们不是早就制造了许多舆论，胡说已经有了一个什么“春桥思想”吗？张春桥要出的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春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他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扼杀学大寨运动的凶恶敌人

去年初，党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怀着极度仇恨，立即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审阅批准，并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二十一号文件下达，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通篇贯穿了毛泽东思想，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及全国各项工作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张春桥却竭力阻止报告精神的贯彻，叫嚷对这个报告要“一条一条地驳”。在张春桥指使下，他的几个亲信竟在他们控制的那个地区的一个党的干部会议上，大放厥词，对华国锋同志的报告逐条攻击，全面否定。还明目张胆地提出三个反对：反对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反对整党整风，反对派工作队下乡，竭力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普及大寨县的部署。

“四人帮”在他们控制的《红旗》杂志上，拒不刊登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还通过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对报告的主要内容，接连发表文章进行攻击、歪曲和诬蔑，妄图全面推翻这个报告，破坏运动的开展。在“四人帮”的干扰下，一时间什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不算数了”，“普及大寨县运动不能提了”，“派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流言蜚语甚嚣尘上。在一部分地方，确实一度造成了思想混乱。有的把整党整风停了下来，有的把工作队撤了回来，使普及大寨县运动，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

华国锋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事实证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搞清

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会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就能大大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坚持反修防修，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能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地，就能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步伐，使农村迅速出现崭新的面貌。张春桥却说什么：“谁知道基本路线教育正确不正确！”“四人帮”百般阻挠、竭力破坏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是反对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妄图保护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复辟资本主义。

整党整风是我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好传统，也是大寨的一条根本经验。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许多县、社、大队，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照大寨根本经验和大寨县的标准进行整风，整出了批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的革命精神，整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整出了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张春桥一伙却攻击整党整风是“老经验”、“形而上学”，狂叫“整一百天也整不出马克思主义”，甚至叫嚷什么“整顿就是复辟”。他们那么起劲地反对整党整风，正好说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扼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魁祸首。

张春桥反对派工作队下乡，诬蔑工作队是在反动路线迫害下去的，煽动工作队回来“造反”。造什么反？说穿了，无非是要保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再就是要搞那套层层揪代理人的阴谋诡计，借以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好干部，把领导机关搞瘫痪，把形势搞乱，以便他们乘机夺权上台。受他们干扰严重的地方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如他们直接插手的温州地区，资本主义泛滥，集体经济瓦解，阶级敌人嚣张，贫下中农受气。在那里坚持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领导群众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的好干部被打成“走资派”；而煽动单干、大搞投机倒把的反被封为“革命派”，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一个好端端的地区被他们糟踏得不成样子，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气愤地说：“江南的鱼米之乡，还要吃调进的玉米高粱。”如果“四人帮”一旦上台，全国就会变得比这还糟，资本主义就会全面复辟，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破坏社会主义农业的刽子手

“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伟大方针，它深刻地阐明了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正确方针。但是张春桥却别有用心地把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把抓阶级斗争和发展农业生产说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回事。他跑到一个农场，大讲什么“要抓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还声色俱厉地教训人说：“我把话说死了，宁愿今年不收粮食，你们要下这个决心。”

张春桥所谓的“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货色？在他的词典里，“阶级斗争”只不过是篡党夺权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他们打着“抓阶级斗争”的幌

子，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不是扣帽子，就是打棍子，层层找“代理人”，处处揪“走资派”。他们到处搞乱党的组织，分裂贫下中农队伍，大肆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大搞无政府主义，挑动武斗，破坏团结，搞乱形势，混水摸鱼，妄想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张春桥曾恶狠狠地说：“不要怕生产搞下去，不要怕形势搞乱，生产下去了，形势乱了，就会把他们打下去”。他左一个“不要怕”，右一个“不要怕”，其目的就是要用破坏革命来破坏生产，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就是要把“形势搞乱”，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干部“打下去”，由他们取而代之。这就是张春桥“抓阶级斗争”的最好注解，一副破坏社会主义农业刽子手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多么阴险恶毒的语言！粮食颗粒无收，八亿人民吃什么？用什么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用什么支援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斗争？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骗子张春桥，竟然鼓吹“颗粒无收”，这恰恰证明他比马克思痛斥的那帮资产阶级传教士们走得更远。

张春桥还丧心病狂地说过“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岂止“没有关系”？！在他们看来，八亿人民简直都应该饿死！张春桥恬不知耻地大谈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四人帮”来说，这点资产阶级法权够用吗？为了满足他们那种挥金如土、荒淫无度的资产阶级糜烂生活，他们不仅要

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还要拚命发展资产阶级的甚至封建的特权，违法乱纪，巧取豪夺，直至吸尽人民的血汗。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地主资本家何止凶恶千百倍！至于八亿人民则非要严格“控制”不可，再苦一点也“没有关系”。他们这伙吸血鬼，正如列宁当时所揭露的苏维埃社会的败类那样，“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9页）但是，“四人帮”完全错估了形势，一心想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骑在苏联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种美梦，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亿人民的中国土地上，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粉碎了“四人帮”，形势无限好，革命起高潮，生产展新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贯彻会议精神，打一场大揭大批“四人帮”人民战争，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信心百倍地大于社会主义，为建设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实现农业机械化 是我国农村一场深刻革命

——批判“四人帮”打着革命化的幌子
否定机械化的罪行

第一机械工业部大批判组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全国亿万人民的迫切心愿，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伟大部署。早在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主席就教导我们：“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主席明确提出，用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号召“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华国锋同志忠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号召全党在普及大寨县的过程中，“向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充分发挥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保证在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华国锋同志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会议以后，立即掀起了一个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群众运动的高潮。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怀有刻骨仇恨，他们恶毒攻击诬蔑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疯狂破坏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反党分子江青胡说什么“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给扣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张春桥指使上海不准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很明显，“四人帮”的恶毒攻击，矛头不仅对着华国锋同志，而且直接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把机械化和革命化对立起来，借口革命化否定机械化，他们一伙攻击搞机械化是“只要现代化，不要革命化”。谁要一提机械化，就说你搞“唯生产力论”；谁要一抓机械化，就说你“路线不正确”。他们搞乱了理论，搞乱了思想，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四人帮”反对农业机械化的谬论，把他们颠倒了理论重新颠倒过来，进一步认清农业机械化的意义，弄清革命化和机械化的关系，是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保证。

“四人帮”攻击搞机械化是“只要现代化，不要革命化”，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从根本上抹杀资本主义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性质的农业机械化，要看它和那一种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就是资本主义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资本主义农

业机械化，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机械化的过程，就是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排挤小农，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 and 它相反，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机械化的过程，就是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促进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缩小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差别的过程。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是按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教导，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和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是同资本主义农业机械化有本质区别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也必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突出的表现是，有了农业机器往哪里用？拖拉机往哪里开？“外面赚了钱，社里扔了田”，是这种斗争的反映；“有酒有菜跑得快，没酒没菜它就坏”，也是这种斗争的反映。机器是人制造的，也要由人来掌握，人的思想决定机器的方向。因此，我们历来强调要用革命化来统帅机械化，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党的领导，要用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四人帮”一面污蔑搞机械化是“不要革命化”，一面又反对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狗头军师张春桥一会儿叫嚷“农业机械化是业务部门的事，党委不要抓”，一会又攻击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

下”、“整群众”、妄图取消党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领导，否定用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农业机械化事业。可见，“四人帮”既不要机械化，也不要革命化。“四人帮”是一帮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一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高喊革命是假，大干反革命才是真，这样一些东西怎么会要革命化呢？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应该看到，实现农业机械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绝不单纯是一个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更不仅仅是把农业搞上去的具体增产措施，而是农村合作化后又一场深刻的革命，将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它对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7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靠工农联盟，巩固政权也要靠工农联盟。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彻底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在这个阶段中，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作斗争，使几亿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土地的主人。第

二阶段的工农联盟，是建立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基础上。在这个阶段中，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同富农、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斗争，消灭了富农经济，改造了个体经济，使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现在，为了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巩固起来，必须实行农业机械化。大家看到，我国现阶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工业是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较快；而农业则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乡村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比城市落后，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可以逐步缩小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改变农村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起来。

我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要巩固这个成果，最根本的是要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同时，要大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农村的社会生产力。随着农业从手工生产转变为大机器生产，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林牧副渔可以全面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将逐步得到提高，使农民进一步体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就能经得起阶级斗争狂风暴雨的考验。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就自力更生办机械化，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妖风的影响下，有少数人提出要把大集体变成小集体。贫下中农顶住了单干风，他们说：“公社是大家大业，谁想分也分不了，我们的拖拉机，

还能你分个方向盘，他分一个轮胎？”贫下中农朴素的语言，深刻地说明了机械化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

实行农业机械化，不仅是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推进农村所有制革命的杠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互相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生产关系进一步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人民公社现阶段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基本上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随着农业从手工生产改变为大机器生产，就要求把土地联成大片，要求社队工业不断发展，公社、生产大队两级经济将迅速增加，穷队赶上富队的进程也将大大加速，从而为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创造条件。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几倍、几十倍地提高，就能在不远的将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更远的将来，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四人帮”带着资产阶级的偏见，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也就根本看不到农业机械化对所有制革命的巨大作用，只是空喊革命，空喊过渡。张春桥在他的反党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煞有介事地谈论“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姚文元在他的反党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也侈谈“消灭阶级”的条件。但如何过渡？怎样消灭？这两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闭口不谈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重要条

件，而且拚命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实现过渡，消灭阶级，当然要搞好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大大提高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但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大发展。不抓农业机械化，不努力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就只能象刘少奇、陈伯达那样，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剥夺农民。这那里是搞什么革命，是道道地地的破坏革命。

“四人帮”攻击搞机械化是“不要革命化”，完全背叛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最有远见，最了解自己的阶级使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阶级是和大机器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由手工生产变为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同时也是对农民的改造。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就可以把现代科学技术带到广大农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大量机器下乡，在一切可以使用机器的地方，都使用上机器，农民普遍接触机器，使用机器，也有利于改造集体农民残存下来的小生产者的心理和习惯，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列宁说过：“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列宁在这里讲了四个只有，充分说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用先进技术装备农业对农民思想变化的重要意义。“四人帮”从唯心论出发，否定物质基础，否定先进技术，否定机械化和电气化，彻底暴露了他们是一伙不顾人民

死活的害人帮，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

砸烂了“四人帮”，扫除了害人虫，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地抓革命、促生产，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现在离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只有四年时间了。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拿出比过去更大的干劲，为毛主席提出的、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光明日报》）

一场围绕自然科学 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

教育部大批判组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科学教育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得到伟大领袖
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关心和重视。但是，近几年来，有
一个奇怪的现象：毛主席、周总理多次强调要加强的基础理
论工作却被“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一而再、再而三
地诬之为“妖风”、“阴风”而大加“围剿”。谁要是提及
一下“基础理论”，就仿佛偷吃了“禁果”，犯下“弥天大
罪”，“四人帮”的“帽子”和“棍子”就向你劈头盖脑地
砸来。

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这是一般的学术之争
吗？不是。这是孤立的现象吗？不是。随着王张江姚反党集
团的被粉碎，这个问题的性质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深刻反映。

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围绕基础理论工作问题，“四人帮”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三次
猖狂的进攻，以此作为他们陷害周总理，篡党夺权的一个借
口，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同

“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发展我国基础科学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及其基础理论，对天体演化、基本粒子、生命起源三大基本理论方面的发展尤为关注。一九七二年，毛主席对一位科学家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意见，表示了称赞。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对抓好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搞好理科教育革命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材等方面，做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还严肃地指出：“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这对于克服一段时间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干扰而造成的忽视基础理论的倾向，对于坚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基础科学搞上去，对于巩固和完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科技、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都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及其在教育界的那个黑干将对周总理指示百般封锁、阳奉阴违、疯狂对抗。周总理指示要研究并实施的一项关于基础科学工作的建议，他们一不议，二不办。其他负责同志去抓，他们干扰破坏。就这样，不仅使周总理的指示“如浮云一样”过去了，而且他们还在背地里恶毒攻击说，周总理的指示是“妖风”。这真是东风吹驴耳，不进反狂鸣！这里，我们看看他们怎样挖空心地借周培源同志当时写的一篇文章施展阴谋诡计。

一九七二年春，周培源同志应约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以下简称《看法》）的文章，谈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周总理指示的一些体会，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和重视。然而，“四人帮”却视为异端，一直拖到了十月份，姚文元与张春桥合谋，耍了一个两面派的花招，一方面以《人民日报》发表会干扰批林整风为由，批转到《光明日报》发表；一方面又暗中指使他们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组织批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奉其主子的旨意，一面派人到北京摸底，一面策动学校组织人马批判。果然，经过一个月的背地摸底和幕后策划，这份报纸以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方式，或唱双簧，或谈体会，或借学生之口，连篇累牍地发文，对这篇文章大布围剿阵。

人们要问：一篇关于理科教育革命的讨论文章，为什么惹得“四人帮”大动肝火，如此兴师动众，围攻挞伐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里面包藏着一个极其险恶的反革命目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曾给他的亲信下过一道密令：“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请同志们注意，要害就在“后台”二字上。明批《看法》，暗掀“后台”，一语道出了张春桥的反动本意。原来这个早堕入“当总理”太虚幻境的家伙，就是要把牙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搬掉他们窃国篡党的巨大障碍。怎么个“批”法？阴险狡诈的张春桥，鹅毛扇一摇，狗头里挤出了个鬼点子。听听他对周总理的恶毒诽谤吧：“他可以拿洋人的话压我们，我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压他们。”这里，前半句是无耻的捏造，后半句是疯狂的反扑。狗头军师一煽风，反动文痞姚文元马上就点火，说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

视基础理论的，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主子放个屁，奴才唱台戏。“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和亲信立即鼓噪而起，什么“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呀，什么“我们现在给一些叫嚷基础的人搞昏了”呀，等等。于是，一个打扮得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骗人命题，便由他们控制的《文汇报》连夜拉学生炮制黑文，抛将出去了。为了集中攻“后台”，他们取消了原定公开批《看法》的打算，更显出其意向决非在一篇文章上。

“四人帮”满以为唱唱高调就可以压倒无产阶级了，这不过是痴心妄想。他们摆出既懂哲学，又懂科学的架式吓人，其实是狗屁不通。正如毛主席后来批判他们的那样：“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稍加剖析，就可以看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是一个否认和取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诡辩论命题。试问，科学技术本身有没有基础科学，有没有基础理论呢？马克思在讲到科学技术发展时就曾指出：力学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16页）。马克思的话指明了工农业包括其生产和技术在内，都是有其基础科学的。毛主席也说过：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的基础上面的。既然工、农、医各种技术科学有其基础理论，那么这些基础理论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呢？当然不能。毛主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整顿党的作风》)，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

这里有两个关系：一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特别是其基础理论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科学的基础，而辩证唯物主义又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二是自然科学中工、农、医各种技术的应用科学与数、理、化、生、地等基础科学的关系。应用科学为基础科学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和实践的基础，而基础科学又成为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毋庸置疑，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自然科学当然也毫不例外。但决不能把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与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混淆和等同起来。文痞姚文元故意把这两个关系、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别有用心地在“基础”二字上偷换概念，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基础科学，否认基础科学的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他是在着意抬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实质上是贬低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作用，把它降低到具体的基础科学的地位上。“四人帮”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卑劣伎俩，真可谓诡辩到家。他们的罪恶企图在于一箭双雕：既搞乱哲学和科学、基础和应用的辩证关系，取消和破坏基础科学研究与理科教育革命，又伪造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罪名，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何其毒也！一九七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接见一位科学家时，指定要周培源同志参加，再次表示了对基础科学的极大关心和对革命知识分

子热情关怀，同时这也是对“四人帮”妄图陷害周总理的有力回击。

二

一波未平，又起一浪。围绕着基础理论研究问题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而是更深入更激烈地展开了。

一九七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一位科学家时，对周总理转呈的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材的意见表示了赞成，并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极其精辟而深刻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辩证关系，驱散了“四人帮”一九七二年散布的层层迷雾，指明了自然科学及其基础理论探索研究的道路。这时，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大学理科招生问题，又一次作了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科技界、教育界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干部、师生和科技人员。大家开展基础科学工作的革命热忱又一次迸发出来。在毛主席光辉指示指引下，有关部门组成了我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小组。然而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四人帮”设置的层层障碍。规划小组到上海调查时，“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和亲信有意挑拨和煽动不满，说什么“单独调查基础科学离开实践”啦，什么“单独调查会使知识分子产生不必要的敏感”啦。这个小组认真学习，深入调查，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短时间内即草拟出全国基础科学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但是，“四人帮”及其一手把持教育领导部门的那个黑干将采用不过问，

不理睬，不听汇报的反革命手法，致使规划草案束之高阁。这是“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破坏我国基础科学工作的又一严重罪行。

最令人气愤的是，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科技界、教育界煽风点火，把一九七三年贯彻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理论课教学，诬之为“复辟回潮”。作为科技、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大批特批，光“帽子”就有刮“理论风”、“基础风”，搞“三脱离”、“走老路”四五顶之多。

所谓“抓基础理论就是走‘三脱离’的老路”，这是“四人帮”及其死党为大反所谓“理论风”、“基础风”而提出的一个蛊惑人心的论调。为了掩饰他们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的丑恶面目，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刊物上重新拿出《看法》一文，不点名地进行批判，说什么“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有的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理科就是要搞基本理论，实际上就是重走‘三脱离’的回头路。”这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不能容忍的歪曲和割裂。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既反对那种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也反对那种离开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清理和检验原有的基础理论，发展和创造新的基础理论。毛主席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周总理也多次强调：“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用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自然科学理论。”那种认为一提基础

理论就一定是脱离实践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的偏见。“四人帮”大反“理论风”、“基础风”，并不是重视实践，而是既破坏理论，又反对实践。他们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二破坏生产斗争，三取消科学实验，是从根本上反对三大革命实践的。他们有意在基础理论上编造谎言，进行诡辩，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搞乱，正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又一个典型例证。

在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第二次攻击《看法》一文的阴谋活动时，我们不能不提到狗头军师张春桥的一次丑恶表演。这个家伙又一次重演了三十年代他在“三月的租界”扼杀进步文艺作品的故伎，信口雌黄，讥讽地说，这篇文章“三百年以后有用”。这不仅是对《看法》一文，而且也是对基础科学工作的恶意攻击。不错，《看法》一文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满足国家当前建设需要又要照顾长远需要时，引用过三百年前从科学实验中发现的、仍在目前生产中广泛应用的微积分作例子，说明了基础理论的深远影响。这有什么不对呢？这里哪有一点提倡进行“三百年以后有用”的科学研究的意思呢？毫无疑问，理论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和服务于生产实践。但对某些处在实验研究阶段，暂时还看不出实际应用，却具有长远意义的探索性科研项目，是否就可以轻视或取消呢？让我们读一读恩格斯的一段话吧：“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周

总理也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在二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是“衷心喜悦”、“给以足够的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个是极端轻视、大加嘲弄的“四人帮”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两相对照，是何等鲜明啊！

人们有理由责问：为什么一九七二年已经被“四人帮”讨伐过的所谓“理论风”“基础风”，现在又端出来作为“复辟回潮”大做文章呢？

“四人帮”的每一个活动步骤无不与其整个篡权复辟的阴谋紧密相联。他们妄图杜撰一个“基础风”、“理论风”，捏造一个“复辟回潮”的罪名，强加在我们爱戴的周总理身上，作为他们掀所谓“现代的大儒”，组织“江记”内阁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人帮”之心，真是比豺狼还狠，比蛇蝎还毒！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迎头痛击了王洪文等“四人帮”，痛斥了他们对周总理的诬陷，又一次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

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初，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出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在这一形势下，科技、教育战线如何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为把国

民经济搞上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服务，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抓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曾先后对科技、教育部门作了重要指示，在抓好群众性科研活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专业科研机构的作用，对基础科学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负责同志明确指示：教育部要抓基础科学。一九七五年九月，华国锋同志指示科学院要重视理论研究，并指出，批所谓“理论风”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具体指示，给科技、教育界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很大的鼓舞。教育部有关部门决定把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理科教育革命和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并且成立了专门小组。为了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分别编辑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部内工作人员学习研究，指导工作。

正当这项工作积极而稳妥地开展起来的时候，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及其在教育界的黑干将，又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反扑过来。

“四人帮”首先利用篡夺的舆论工具，又一次借基础科学工作问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射来一支支反革命毒箭。他们炮制和发表大量文章，肆意割裂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公然大批特批“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大肆攻击“科研要走在前

面”是什么“奇谈怪论”，矛头又指向谁呢？我们知道，周总理早就指出：“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应当联系实际，使研究工作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在三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这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整顿党的作风》）的教导。“四人帮”与此相对抗，根本否认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生产和技术的能动作用，只能导致技术上照猫画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一步一步爬行。他们乱扣在别人头上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大帽子，戴在他们自己头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岂但如此，他们还借批《汇报提纲》，私整和散发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煽阴风，点鬼火，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妄图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极力对抗和诽谤华国锋同志对批所谓“理论风”错误的正确批评，说成是什么为基础理论“翻案”。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篡改华国锋同志“强调依靠工农是对的”这句话，打进一个“相”字，变成“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然后张冠李戴地进行批判，由他们控制的一个刊物公开抛了出来。仅此一例，就可看出“四人帮”这伙反革命黑帮卑劣无耻到何等地步。

为了使大家开开眼界，这里还须公布一场发生在教育部的反革命丑剧。一九七五年，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刚刚编出，“四人帮”那个奔走于辽宁与北京之间的黑爪牙就采用特务手段私自窃走一份，然后送给“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并向野心家张春桥写诬告信，污蔑编印和学习周总理的指示是什么“党性不纯的表现”等等。一九七六年，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别有用心地把这说

成是“总理语录”事件，然后在大会小会、会上会下严加追查，制造白色恐怖。他们公开叫嚷“为什么把‘总理语录’印出来，为什么把总理的指示提到那么突出的地位？”还声色俱厉地宣称：“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请看，“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仇恨敬爱的周总理，仇恨爱戴周总理的人民群众，已经达到何等猖獗的程度！

然而，就在“四人帮”得意忘形，准备穿龙袍，登皇位的时候，轰然一声震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篡权迷梦。毛主席生前要打烂的但还没来得及解决的反党“四人帮”，现在打烂了。“四人帮”借基础理论问题所做的种种反党表演，已经成为他们不容抵赖的历史罪证。

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纵观几年来在基础科学研究问题上的政治斗争，重温周总理遵照毛主席一贯教导所做的加强基础科学工作的重要指示，历数“四人帮”破坏基础科学研究，阴谋篡权复辟的累累罪行，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周总理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正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把科学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来抓基础理论工作的。“四人帮”的诅咒和毁谤，丝毫无损于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丝毫磨灭不了周总理指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同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四人帮”是货真价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代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危险性和破坏性。他们破坏的决不只是基础科学研究，而是要败坏整个

社会主义大业。对于他们的累累罪行，我们必须继续深揭狠批，彻底清算。

我们坚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清算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一定能够迅速落实。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教育、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树雄心，立壮志，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一定能够夺回被“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整个教育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必将更加突飞猛进，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有着无量的前程！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光明日报》）

围绕鲁迅著作出版问题的一场搏斗

——揭露“四人帮”破坏鲁迅著作
出版工作的罪行

国家出版局批判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婴同志就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写信反映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周海婴同志的信后，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作了重要批示，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指示作出决定，“立即实行”。不久，毛主席、党中央又批准了有关部门关于鲁迅著作研究和出版的报告。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有力地支持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学习鲁迅著作的迫切愿望，给“四人帮”长期以来破坏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的罪恶行径以致命的打击。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长期以来，在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工作中，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算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尽早读到重新注释的鲁迅著作。但是，直到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批示下达之前，大量珍贵

的鲁迅书信一直不能出版，重新注释的鲁迅亲自编定的单行本一本也没有。人们要问：为什么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得不到解决，原因在哪儿？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原因就在“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据的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王张江姚“四人帮”如同魔鬼怕见阳光那样对鲁迅极端仇视，极端恐惧，他们一直反对毛主席关于“读点鲁迅”的伟大号召，不准出版鲁迅著作。因为他们深知，广大人民学习鲁迅的革命思想和精神，对他们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将会带来极大的威胁。

一九七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确定重新整理出版鲁迅著作是全国重点项目之一，要调集力量，“争取两三年内完成”。为了贯彻落实这一规划，国家出版部门在会后立即进行广泛调查，听取多方面意见，写了《关于重版鲁迅著作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鲁迅杂文书信选》、《鲁迅创作选》、鲁迅著作单行本、新编《鲁迅全集》（包括日记、译文序跋等）、《鲁迅选集》以及鲁迅手稿等，都将从一九七二年起陆续出版。一九七二年一月，反革命文痞姚文元明明知道周总理对出版鲁迅著作非常关心，出版会议中提出的出版工作规划他也看过，但是当这个反党阴谋家拿到这份具体实施方案的报告以后，却背着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待研究”为名，立刻将它打入冷宫。此后，有关部门又先后写过多次报告，一次又一次提出建议，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原来姚文元的所谓“待研究”，就是“不准出”，这是“四人帮”的一个障眼法。也可以说是他们破坏鲁迅著

作出版的一种特有的磨拖战术，磨得你怎么办都不行，拖得你什么也不能出。

反党阴谋家姚文元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扼杀鲁迅著作的出版。现在仅就他破坏《鲁迅杂文书信选》的情况加以揭露和批判。提起这本《鲁迅杂文书信选》，出版部门的革命群众肺都气炸了。还在出版会议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约请南开大学中文系、鲁迅博物馆等单位日夜奋战，进行编选注释。因此，《报告》特意写明，它已编辑就绪，上机待印。姚文元一看，可慌了手脚，砍去，太暴露；让出，又不甘心。于是他绞尽了文痞的脑汁，终于施出了一系列的鬼蜮伎俩。他在一月二十一日声称：（一）杂文可以出，但“以同书信分开为好”，就是说，书信应当砍掉；（二）“上海也要出类似选集”，“以协商出一种为宜”；（三）杂文选目录“大体编好之后”，要送他“审阅”。因为姚文元这一声黑令，出版单位只好将上机待印的《鲁迅杂文书信选》立即停印，并派人到上海联系。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却假惺惺地说：上海没有出版鲁迅选集的计划，也不打算正式出版《鲁迅杂文选》。二月，有关部门将这一情况报告姚文元，并附调整后的《鲁迅杂文选》选目。几天后，他将选目作了若干增删退回，让再搞一份送他“审阅”。三月，一份全面调整后的《鲁迅杂文选》二校样连同“出版说明”，又送给了姚文元。不料从此他却一声不吭，扣压达半年之久，几次打电话催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放在桌上，没有时间看”。十一月，出版单位又将《鲁迅创作选》二校样送给姚，并催问《鲁迅杂文选》“审查”的结果，说明既然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的全盘计划暂时不予批示，可否先出这两本选集，以应

“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的迫切要求”。这个黑透了心肠的反革命文痞这次不再遮遮掩掩了，十二月二日，他黑笔一挥：“创作选”、“杂文选”，通通“不必再选了”！就这样一刀砍到广大工农兵和出版战线革命战士的身上。

尽管如此，姚文元在砍了《鲁迅杂文选》以后，仍继续要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装模作样地说：鲁迅著作还是可以出的，但只能出鲁迅自己生前编定的单行本，理由是：“以省注解之繁”。他还将这个“批示”送给张春桥、江青，这伙黑帮沆瀣一气，都在当天画押同意。经过他们这番丑恶的“双簧”表演，不但砍掉了鲁迅著作的选本，而且连注释鲁迅著作的权利也被砍了。

从姚文元扣压第一份报告，到他和张春桥、江青串通一气扼杀《鲁迅杂文选》，“四人帮”破坏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真是处心积虑，诡计多端。他们以“待研究”为名，扣压了鲁迅著作出版的多次报告；他们下令“不必再选”，扼杀了一系列即将问世的鲁迅著作选本；他们还用“以省注解之繁”为借口，妄图阻止对鲁迅著作的注释。总之，按照“四人帮”这套逻辑，鲁迅著作就是不能注释，不能出版。他们这样卑劣地破坏和阻挠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实际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无产阶级实行赤裸裸的反革命专政，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姚文元这个破坏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的罪魁，当感到自己的假面可能会被戳穿时，立刻就使出上海洋场的流氓手段，企图一溜了之。一九七四年一月，一位从事鲁迅研究的老同志写信给姚文元，对鲁迅著作迟迟不能出版提出意见，这时他故作惊讶，批转出版部门提出具体意

见。不知这个文痞为何健忘若此，那份被他打入冷宫的《报告》，不就是具体意见吗？当时他要“待研究”，一“待”两年了，还没有“研究”出一个结果。现在他却佯装不知，又要摆布出版部门向他提出具体意见。二月，当出版部门再一次将具体方案送去时，他又故伎重演，仍是不予理睬。直到“四人帮”垮台，这个姚文元还是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四人帮”就是这样一伙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四人帮”破坏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理所当然地要激起无产阶级的无比义愤。周海婴同志的信，正是广大群众这种义愤的集中反映。可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周海婴同志的信作了光辉的批示以后，“四人帮”又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猖狂而又丑恶的表演。

“四人帮”对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极端仇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张春桥在不得不向有关同志传达毛主席批示时，只是拿文件给看了一看，说了句“你们去做计划报中央”。他一句也不讲毛主席批示的重要意义，也不说半句对周海婴同志的信的意见，却大谈什么“我现在忙得很，这事那事一大堆，偏偏又碰上你们这个事”。这串半是怨恨半是恼怒的黑话，把“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批示的阴暗心理，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张春桥说他“忙”。是呀，“四人帮”一伙从那时到垮台，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一步比一步紧，确实忙得很哪。“偏偏又碰上你们这个事”，张春桥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这一回倒算说了句实话，直言不讳地供认出版鲁迅著作不是他们的事。可是，“偏偏又碰上了”，看他这不耐烦的劲儿，恨不得倾肠刮肚全都抖搂出来才觉着痛快。毛主席的批示打乱了“四人帮”反革命的阵脚，这就是张春

桥为什么这样满腹怨恨的根由所在。

如果说张春桥这番牢骚所发泄的只是一种既怒且恨的情绪，那么接着而来的就是对周海婴同志杀气腾腾的吼叫了。

“四人帮”的拿手武器是“帽子”和“棍子”，这回也不例外。他们一会儿亲自出马，一会儿通过他们的心腹，到处造谣，说周海婴同志写信是“有人指使的”。姚文元还派人调查周海婴同志“接近什么人”，叫嚣要抓“后台”。他们还通过别人肆意歪曲和攻击这封信的内容，污蔑它在感情上反映的只是“父子之情”，思想上则“反映了鲁迅研究上的一种旧的习惯势力的情绪”，等等。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赞成的这封信，就是要借打击、镇压写信人来发泄对毛主席批示的仇视和恐惧，矛头所向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猖狂如此，令人发指！

毛主席批示要作出决定，“立即实行”，这就是要打破“四人帮”对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的反革命封锁。而“四人帮”一面在他们控制的一些地方拒不传达毛主席批示，一面继续破坏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工作，表明他们要一意孤行，顽固到底的反革命决心。去年四月，国家出版局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座谈会，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示，交流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和研究工作的经验，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批示。会议期间，各省市与会同志学习毛主席批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大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最了解鲁迅，最了解全国人民要求学习鲁迅著作的迫切心情。可是，“四人帮”却躲在一边，恨得咬牙切齿。会后，他们把御用写作班子里一个参加会议的人找去，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分别单独接见，对这次会议肆意攻击。姚文元说，这个会请他几次，他

就是不去，发泄对毛主席批示的不满。张春桥则说什么“北京和上海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后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就公开宣称：“北京要把上海吃掉”。他们心目中的“北京”和“上海”，决不是不同区域的概念，而是两种根本对立营垒的代称。他们要和北京唱对台戏，就是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分庭抗礼。

“四人帮”那么仇视鲁迅著作，处心积虑地破坏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伙历史上“大半不是正路人”的野心家、阴谋家，生怕鲁迅思想的光芒照出他们钻进革命营垒的“内奸”和“蛀虫”的真正面目，唯恐鲁迅著作的传播会使他们现出“假革命的反革命”的原形。

鲁迅说：“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早在三十年代，野心家江青就争演“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九天护国娘娘”赛金花，她正是鲁迅批判的那类“不是东西之流”。姚文元则是鲁迅痛斥“转向”的无耻叛徒姚蓬子的孝子。解放后，他挤进文坛，充当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吹鼓手。至于张春桥，早就是追随王明路线，围剿鲁迅，向敌人“献媚”和“缴械”的老投降派。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这群丑类时刻都感到，鲁迅著作的传播，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的生存。特别是那篇《三月的租界》，就象一根系命的捞什子拴在“四人帮”的脖子上，碰也不敢让人碰一下。

“四人帮”一伙，早就知道“狄克”是个什么东西。还在一九六六年，上海就有人告诉姚文元，说他从某个资料中看到，狄克就是张春桥，张还同反共老手陈伯达一起围攻过鲁迅。当时，姚文元装得若无其事，说：“算了，想想我们

一些同志前些年写的文章，也不见得都是正确的。”“四人帮”的一个余党也赶忙跳出来帮腔：“姚文元说的对，过去的讲它干什么？”而且还以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式勒令：以后不许再多嘴了！

“四人帮”这伙唯心主义的笨驴，满以为“不讲”就能把历史的罪恶抹去。鲁迅曾经讽刺过反动派的那些所谓“名人”“抹杀旧账”的种种手法，其中最简捷也是最无耻的一种就是“眼也不白，问也不问”，好象压根儿没这回事似的。

“四人帮”采用的也正是这种卑劣手法。但是，他们表面上装得镇静，内心却极端虚弱，生怕有人揭了他们的反革命老底。

一九六八年，上海有一部分革命同志贴张春桥的大字报，造了他的反。“四人帮”的两个余党一听就吓了一跳，立刻意识到：“是不是三十年代事发”？他们这种胆战心惊的样子，不是和胡风那种咳一声都怕有人录音一模一样吗？

一九七〇年，上海一个大学编了一份题为《学习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鲁迅文摘，先在报上发表，以后又准备印成单行本。就在这时，“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放风，说：“这是有人借鲁迅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不但下令不准印行，而且还叫嚷要对编辑人员进行审查。人们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大动肝火？原来这份材料引了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一封信，说他曾写了两篇文章痛击了周扬一伙“英雄”。编者注明：鲁迅说的“二文”，是指《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刺中了张春桥这块心病，他们怎能不肝火大发？！

一九七二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筹备开放，陈列方案中有

《三月的租界》一文。他们立刻惊恐万状，赶忙派人把陈列小样要去，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审查”，借口“不要繁琐”，把《三月的租界》一文抽去，才让开放。

“四人帮”对上海图书馆保存的三十年代报刊资料尤为恐惧，先是派人查封，后又以“工作需要”为名全部拿走，并且对几十名革命群众进行种种打击和迫害。有的同志只因讲了一句狄克即是张春桥，就被打成“反革命”，下令拘捕，关押数年之久。

“四人帮”就是这样凭借手中窃取的权力滥施淫威，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

原稿可以不让展出，资料可以封存，但有鲁迅的著作在，“四人帮”总觉得如芒在背，坐卧也不安宁。怎么办呢？还是姚文元这个反革命文痞的鬼点子多。他抛出一道黑令：不准出选本。而且还编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以省注解之繁”。这样，象《三月的租界》就不会引起读者的特别留心，即使看了，大多数人也无法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了。姚文元将这个黑点子送给了江青、张春桥，立即得到满口的赞成，他们当时可真乐了一阵。不料好景不长，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赞成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这就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但他们一着不成又来一着。当毛主席批示传达以后，张春桥又苦思对策，提出“注释越简单越好”，甚至说，把五八年版注释“略加修改”就可以了。他还唯恐别人领会不准，赶忙又补充一句：“周扬没篡改的”，就“不需要注释什么了”。实际是要把周扬一伙搞的注释稍作修补重新抛出。翻开一九五八年版的《鲁迅全集》一查，《三月的租界》的注释，对狄克其人，

未置一词。张春桥真不愧为“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他这一阴谋，不但把毛主席批示要搞新注释的精神篡改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妄图长久掩盖自己罪恶的历史。一箭双雕，用心可谓良苦矣！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对此心领神会，当有人提出鲁迅著作中涉及好多人搞不清楚，要广泛查阅有关资料时，这个家伙立即跳了起来，叫嚷：“不要把注释组搞成专案组！”污蔑提意见的同志是“要把注释引入歧路”，是“搞繁琐考证”。好家伙，一顶一顶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以为靠这些帽子定会把人压死，也会把他们主子肮脏的历史捂起来。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四人帮”为了掩盖自己丑恶历史，阴谋篡党夺权，一直疯狂破坏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但是心劳日拙。他们跳得那么高，鲁迅依然是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岿然不动，最终是他们自己“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各地工农兵作者和专业人员以及出版战线的广大革命战士精神振奋，正在加紧步伐，为争取《鲁迅全集》和其他鲁迅著作新编注释本早日出版贡献力量。鲁迅著作的光辉，将鼓舞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永远进击！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光明日报》）

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

——揭发、批判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篡党夺权舆论工具的罪行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

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对广播、电视工作极为关心，极为重视，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笔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人民广播事业指出了政治方向，制定了指导方针。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刘少奇、林彪一样，十分懂得舆论工具的重要性，拚死地向无产阶级争夺广播、电视这块舆论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把黑手伸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他们打击和迫害革命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指使受蒙蔽的学生冲击电台。江青疯狂叫嚷：“广播电台这样重要的单位，我们管定了！”反革命吹鼓手姚文元窃取了宣传大权以后，把广播、电视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对抗毛主席的光

辉题词，篡改广播、电视的政治方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姚文元在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中，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是全国电视观众的迫切愿望和最大幸福。一九七五年九月，毛主席会见一位外国客人时，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电视记者拍了不少好镜头。可是，姚文元在审片时却提出：“不要近景，只要全景就行了。”记者要求保留毛主席的两个近景镜头，姚文元也拒不采纳。毛主席送客人到门口，和客人握手告别，表明毛主席身体健康，姚文元却不许拍这个镜头，只让记者去拍客人上车的镜头。那个一贯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江青，对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根本不重视，不管多么急的片子，送到她那里要她审，她不是打扑克，就是散步，迟迟不看，甚至还恶毒地攻击说：“反正没有什么新鲜的！”真是反动透顶！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广大干部、群众满怀无比悲痛的心情瞻仰毛主席的遗容，个个失声恸哭。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却砍掉了许多感人肺腑的镜头，连哭泣声也不准多用。中央决定，广播、电视要转播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为了使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同志和海外侨胞能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局准备使用正在休息的对国外广播的机器和频率同时转播，也被姚文元下令禁止。“四人帮”的心比毒蛇还要毒！

一九七四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工农兵的理论队伍茁壮成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在这个

群众性的学习热潮中，广大工农兵和基层干部强烈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讲座节目，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根据广大听众的迫切要求，中央台组织了一个工农兵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相结合的播讲班子，准备系统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几本书。请示报告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送给姚文元，他却一直不批。直到十一月十四日，他才在一次谈话中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写了一个报告，我一直压着没批，也不好否，我让你们去征求工农兵的意见。”短短的几句话，姚文元两面三刀、阴险狡猾的嘴脸暴露无遗。报告上明明写着宣传几本书的计划是根据工农兵的意见提出的，姚文元反对这个计划，但害怕过于露骨，“不好否”，于是，又反过来让中央台去“征求工农兵的意见”。这是姚文元为了达到他反对宣传马列的罪恶目的，而煞费苦心寻找出来的借口。姚文元还胡说中央台系统地宣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容易出问题”，为了掩人耳目，他出了个鬼点子，让“在每本书上抓几个问题”，零敲碎打地组织几篇“短小”的“学习体会文章”。抓什么问题？这当然要根据他们“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的需要。怎样抓？就是借题发挥，大搞形而上学，片面性，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某本书只不过是幌子而已。中央台宣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计划就这样被姚文元扼杀了。

姚文元还利用广播、电视这个舆论工具，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另一方面，无耻地突出他们自己。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

毛主席，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中央政治局进行突然袭击。会上，江青、姚文元俨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出场，他们的两个亲信一唱一和，气焰嚣张地作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企图把这个大会的录音在全国各地播放。

一月二十七日，姚文元给广播局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责问为什么大会的录音没有录好，把他和江青的插话“搞的一塌糊涂”，“是不是有人捣鬼”？江青、姚文元对录音连续进行了三天的修改，下令复制一百多套，准备发往全国各地。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发现了“四人帮”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不许把录音带往各地发，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敬爱的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战斗任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广播周总理的讲话录音，姚文元却借口只是“简短祝酒”，不准广播。电视新闻片也不用周总理讲话的全文。

周总理在世时，“四人帮”想方设法地诬陷、折磨和迫害他；周总理逝世后，姚文元又千方百计地破坏周总理丧事的报道工作。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在电视里瞻仰周总理的遗容，有电视机的单位，都组织群众轮流收看。姚文元的反革命嗅觉十分灵敏，就亲自对电视“把关”，左一个“批示”，右一个电话，下达了种种禁令：不准电视台广播周总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不准在播映周总理遗像时配哀乐；不准播映周总理的生平照片；不准拍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的场面；不准播映失声恸哭的镜头；不准把百万群众冒着寒风，肃立路旁，为周总理送灵的镜头编入电视片；不准播映有周总理形象的电影；不准在报纸上刊登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预告；不准组织群众收看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不准播映外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的电视片，等等。首都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按计划安排连播三天，可是只播了两天，姚文元就不许再播。由于电视台在报纸上刊登了重播这条电视片的预告，姚文元就一连打了三次电话，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四人帮”对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妄图抹杀周总理为党为人民建树的丰功伟绩，压制全国人民对周总理无限崇敬和怀念的感情，这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据不完全统计，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周内，广播局就接到各地听众和观众的电话一千多次，来信一百多件。许多观众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要求多播几遍悼念周总理的电视片。许多听众质问电台是代表谁的？为什么人民的电台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电台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有的听众在信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怀念、热爱，是封锁不住的，压制不下去的！”听众和观众的质问是何等的好啊！这些充满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电话和信件，正是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愤怒声讨和无情批判。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选定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接班人。去年四月，毛主席曾明确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王张江姚“四人帮”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贬低华国锋同志。按照惯例，毛主席会见外宾时，主要陪见人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是要编入电视片的，可是，

华总理在门口迎接外宾时，姚文元却不许拍摄。唐山地震后，华总理率领中央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姚文元在审看这条电视片时，以“不要暴露灾情”为借口，不准把华总理的许多镜头编入电视片，妄图缩小华总理的巨大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在宣传报道中，拼命突出他们自己。在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奸诈狡猾的张春桥故意长时间地抢镜头。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则厚着脸皮，让再增加一个他自己的镜头。真是无耻已极！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宣传报道中，他们也更加露骨地贬低华主席，更加无耻地突出他们自己。在毛主席的治丧活动中，反党野心家江青在花圈上大作文章，姚文元就在消息和电视片中大肆渲染江青的花圈，为江青当“女皇”制造舆论。姚文元还多次指令电视记者“照好政治局委员的集体镜头”。其实，照好“集体镜头”是假，打着“集体”的幌子，否定华国锋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突出“四人帮”，才是真意。有一次，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发现华主席的镜头较多，大为恼火，强令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镜头加长，用这种阴险的手法贬低华主席。十月三日，姚文元在审看天安门城楼国庆座谈会的电视片时，借口林彪曾经讲过“高举”，下令换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标题，并且通知其他新闻单位，以后不准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时，他还砍掉了这条电视片中华国锋同志讲话的录音和许多镜头，以此发泄他对华主席的刻骨仇恨。在姚文元的控制下，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电视片和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都贬

低了华国锋同志，突出了“四人帮”。“四人帮”如此不择手段地宣扬自己，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可是，这几个人心丧尽的大恶棍，尽管拚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仍然掩饰不住他们的丑恶嘴脸。广大观众在电视里看到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丑态，都嗤之以鼻，有的观众愤怒地关了电视机，有的当即给电视台打电话，对突出宣传“四人帮”提出强烈抗议。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制造篡党夺权反革命舆论的有力回答！

姚文元肆意反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时，他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篡改，塞进私货，大肆鼓吹；有时，则竭力封锁、扣压，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论联合政府》）一九七二年，中央台在《对工人广播》节目的方针里提出要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姚文元大笔一挥，删去了。从此，“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在广播和报刊里消失了。试问，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了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这有什么错误？广播电台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加油鼓劲、呐喊助威，又有什么罪过？姚文元不许宣传劳动竞赛，说穿了，就是害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冲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打乱他们的反革命部署。

在姚文元的控制下，广播、电视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四个现代化”不许讲了，“大干社会主义”不能说了，《大干颂歌万里传》等歌曲不让唱了，甚至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纲领，也不准宣传了；不仅不准公开宣传，甚至在内部简报上写了这句话，也被姚文元恶狠狠地删掉了。再清楚不过了，“四人帮”这几个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既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又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妄图搞垮我国的国民经济，毁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他自己的言行，也泄露了他们的天机。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姚文元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不担心广播工业的发展，我关心的是广播局再经过两三年能不能建设成一支好的队伍，把歪风邪气打下去，一旦有事，党中央让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能经得起阶级斗争和战争的考验。”他所说的“党中央”，就是指“四人帮”；他所说的“歪风邪气”，就是指广大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对“四人帮”的仇视、抵制和斗争；他所说的“一旦有事”，就是指“四人帮”篡党夺权。去年八月，毛主席病重期间，姚文元趁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之机，以“慰问”为名，两次窜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大讲什么“电台还在广播，就说明政权还在发号施令”，“这次是接近于临战”，“锻炼了我们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是一次战备演习”，“要认真总结经验”，等等。显然，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台变成“四人帮”的驯服工具，“一旦有事”，发生“突然事变”，“让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为“四人帮”“发号施令”。这几句话，已经把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和盘托出了！姚文元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四人帮”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

虚弱。他们狗急跳墙之日，也就是彻底覆灭之时。

随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垮台，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打开收音机，声讨“四人帮”的怒吼响彻天际；电视屏幕上，热烈欢呼华主席为我党英明领袖的画面激动人心。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誓作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喉舌，确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把华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准确、及时地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去。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舆论工具的巨大威力，彻底清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切流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而努力办好广播。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清算“四人帮”的罪行， 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批判组

“四人帮”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为了篡党夺权，他们捣乱破坏，无恶不作。我国对外贸易工作也遭到他们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现在，“四害”既除，人心大快。外贸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和光辉前景。

我国对外贸易事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对外贸易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坚持同帝修反作斗争，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扩大国际经济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事业也相应地有了很大发展。目前，我国已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但是，“四人帮”妄图一笔抹煞我国对外贸易的成就。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乱扣帽子，对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大肆造谣污蔑，胡说什么对外贸易领域里“存在着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外贸部是

卖国部”。他们的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敬爱的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妄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事业，搞乱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领导大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四人帮”的捣乱破坏，使我国对外贸易阵地上一时间阴风乍起，黑云翻滚，对内对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很坏的后果。我们必须彻底揭发批判他们破坏外贸工作的罪行，戳穿他们的造谣污蔑，肃清他们在外贸领域中散布的种种流毒。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坚决执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把外贸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外贸方针、政策和重大的计划安排，都是由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和批准的。“四人帮”这伙阴谋家、野心家，拚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对外贸易统制政策。他们利用在中央窃踞的部分权力和地位，把黑手伸向外贸部门。在他们把持的个别地方外贸单位，另立山头，自成体系，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中央的指示，他们公然拒不执行；他们的“意见”，却硬要上级和兄弟单位唯命是听。文痞姚文元污蔑外贸是“不能动，不能问”的“独立王国”，大野心家江青狂妄叫嚷“要革外贸垄断的命”。简直是咬牙切齿，杀气腾腾，恨不得一口把外贸部门吞掉而后快。“四人帮”的罪恶用心，无非是想从

无产阶级手中夺去外贸大权，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引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邪路。

我国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是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的。它是贯彻执行我国对外政策、发展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决不是单纯的同外国做生意，搞买卖。我们的对外贸易必须是经济服从政治，外贸配合外交，严格遵循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了支援友好国家的生产建设和团结反霸斗争的需要，我们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拿出一些物资供应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并且按照需要与可能适当购买一些它们的产品。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不讲外贸要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不讲经济服从政治。在价格问题上，他们反对我国出口商品必须参照国际市场价格该涨就涨、该落就落的原则，大肆污蔑出口商品价格卖低了，“把钱送给资本家了”，扣上“投降”、“卖国”的帽子，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引上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的资本主义邪路。近年来，随着我国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石油产品除供应国内需要外，还能适当拿出一部分供应出口。我国石油出口，本来是自力更生的光辉成就和全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喜事，它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配合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换取社会主义建设物资，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四人帮”却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疯狂反对，恶意污蔑，对我国石油出口拼命进行破坏捣乱，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使我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事实充分表明，“四人帮”的这种行径，完全迎合了帝修反的需要，起到了帝修反起不到

的破坏作用。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帮。

二

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对外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国民经済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在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方面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二十多年来，我们根据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的需要，在有计划地不断扩大出口的同时，进口了一些必要的建设物资和技术设备。某些产品我们既有出口也有进口，主要是为了调剂品种，增加储备，更好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孤陋寡闻、四体不勤的“四人帮”根本不懂社会主义的经済工作，对于外贸也是一窍不通，却摆出一副专家、权威的架势，指手划脚，胡说八道，既攻击我们的出口，也污蔑我们的进口。他们别有用心地捏造所谓“国内很需要的东西也要出口，国内能生产的东西也要进口”的谎言，甚至造谣诽谤，胡说外贸出口“严重影响了国内工农业生产”。

“四人帮”的这种谬论完全是欺人之谈。中国是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总是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解放以来，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从简单机器到人造地球卫星都能自己生产制造。如果按照“四人帮”的荒唐逻辑，自己需要的不出口，自己能造的

不进口，那么我们岂不是既不用出口，也不要进口，外贸工作就可以根本取消了吗？至于说到“严重影响了国内工农业生产”，那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自己。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制造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肆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几年来，谁要搞社会主义生产，他们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加上“为修正主义出力”的罪名。明明是“四人帮”自己在疯狂破坏国民经济，破坏外贸进出口的工作，他们却反咬一口，妄图嫁祸于人。但事实历历在目，谁都看得清楚。他们要颠倒黑白，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口了一些国内需要的建设物资。对于外国的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我们一向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洋为中用”的方针，以及周总理指示的“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的原则，有计划地加以引进。这对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在进口和使用外国的技术和设备时，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决不依赖外国技术，迷信外国技术。我们决不允许象苏修那样让外国资本来开发国内的资源，决不同外国搞联合经营，也决不接受外国的贷款。我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四人帮”污蔑我们“崇洋

媚外”，“投降卖国”，纯粹是无耻澜言。

“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对外国的科学技术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把我国有计划地引进的外国设备、外国技术统统斥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完全是歪曲事实，蓄意污蔑。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们明明知道许多重要的技术设备进口项目是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也别有用心地当作“崇洋媚外”加以咒骂。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他们的这种恶毒攻击遭到华国锋同志严正驳斥时，狗头军师张春桥竟然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叫嚷：“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一句黑话，就活生生地勾画出了这个反革命阴谋家做贼心虚的反动嘴脸，集中地发泄出“四人帮”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刻骨仇恨。为什么华国锋同志坚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四人帮”看来就是“压人”，他们眼里还有毛主席吗？难道他们反对这种“压力”，不就是要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妄图推翻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决定吗？对于“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恶行径，为什么不该“压”？这个“压”，就是“压”得对，“压”得好！

毛主席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四人帮”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四人帮”在疯狂反对和破坏引进对我国有用的外国技术的同时，不惜挥霍大量外汇，醉心于进口外国的东西。有的产品，即使国内已经能够制造，质量不错，可供出口，他们也仍然拒绝使用，坚持要进口“洋货”。他们为了过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大量进口高级化妆品、消费品、营养品以至反动黄色的外国影片。他们一伙思想腐朽透顶，生活糜烂不堪，崇洋媚外到了极点，一味拜倒在洋人洋

货面前，简直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好”，“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洋奴、买办、卖国的帽子，只能不折不扣地戴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事实充分证明，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一帮。他们才真正是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大搞卖国主义勾当的反革命两面派。

* * *

打倒“四人帮”，排除了“四害”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将以更大步伐向前迈进，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必将得到顺利的发展。我国外贸职工，眼看当前大好形势，感到无限振奋，展望未来，更加信心百倍。我们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罪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一定要为我国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为支援世界革命，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

教育部大批判组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篡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全盘否定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恣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很大危害。他们的种种谬论，必须深入批判，他们的累累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以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四人帮”为了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首先篡改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估计。

一九五七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

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毛主席所作的这一分析和结论，反映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实际，是我们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础。只有坚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正确估计，才能用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

但是，“四人帮”把毛主席的指示抛到一边，“帽子工厂”却越开越大。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他们从来不做具体分析，就任意给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四人帮”围剿湘剧《园丁之歌》，把剧中坚持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青年教师俞英，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且给她加上了“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胡说什么：解放后十七年的学校“在那里一年一年地、一批又一批地造就这些人，毕业后还得重新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还唆使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到处狂叫：如果社会帝国主义打到中国来，大多数教师“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假如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话，恐怕比现在还高兴”，等等。“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这些攻击和污蔑，反映出他们对广大知识分子有另一种估计，即反对毛主席科学论断，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敌我关系的反革命估计。他们把旧教育制度和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混为一谈，这就从根

本上篡改了毛主席教育革命的理论，转移了教育革命的方向。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知识分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涌现出一大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而“四人帮”对此却一笔抹杀，一概否定，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呢？

二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毛主席又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一九五七年，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宏大的知识分子新部队中，就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正确指出了广大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鼓舞和鞭策着他们为适应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

一贯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四人帮”，竭力否定知识分

子的革命作用。一九七四年，他们在国务院科教组的那个黑干将，大肆鼓吹们所谓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的谬论，就是他们颇有代表性的论点。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关键是使他们附在哪张“皮”上。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与工农兵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改造。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由此可见，“四人帮”鼓吹的所谓“破坏论”，道理上是反动的，事实上也是荒谬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乃至整个上层建筑起破坏作用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这一帮害人虫。同广大工人农民处于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的不正是他们吗？极其贪婪地侵吞国家财富的不也是他们吗？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搞乱我们整个国家的不还是他们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而不是要打倒广大教师。相反，更要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团结广大教师。当然，广大教师也

要在教育革命这个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打击了广大教师，也就破坏了教育革命。“四人帮”动不动就斥责教师是“右倾复辟势力”，甚至居然提出取消教师的荒谬主张。“四人帮”的一个女黑干将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搞“试验”，竟然说什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妄图创造一个取消教师而由学生自治的“典型”，拿出来放“卫星”！“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蓄意全盘否定教师在教育革命中的作用，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广大革命教师为敌的丑恶嘴脸。可以想象，如果“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一旦得逞，那么包括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就会遭到他们法西斯专政的疯狂镇压。

三

“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破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又破坏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

为了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团结”和“教育”、“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团结是我们的出发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耐心细致地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帮助他们把立足点真正移到无产阶级一边来。这样，同工农兵的感情深了，共同语言多了，也就增强了团结。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同他们搞好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

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努力改造旧思想的同时，专心致志地工作。这样做，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的。

“四人帮”一伙对广大知识分子百般仇视，一会儿辱骂他们是“围着臭鱼烂虾转”的“苍蝇”，一会儿又诬蔑他们是“书蛀虫”，根本谈不上半点团结。而对少数心甘情愿为他们篡党夺权效劳的人，却大施恩惠，大加吹捧，委以重任，抱成一团。臭名昭著的“梁效”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吗？

“四人帮”确实把“改造”喊得震天响，似乎只有他们才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实际上，在他们那里，对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所谓“教育”、“改造”，不过是“打棍子”、“戴帽子”的代名词罢了。“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公然胡说什么：“改造教师就象水中按皮球，压一压下去了，一松手又会浮上来”，必须“永远把他们压在深水之中。”他们任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利用发生在一个小孩子身上的人民内部的一般是非问题，大作文章，无限上纲，把“师道尊严”说成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煽动学生把教师当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来批判，甚至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有错误的教师和干部，打成“败类”，扬言要实行“专政”、“判重刑”。这哪里是在抓“改造”？分明是镇压，搞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用“大棍子”打人，用“大帽子”压人，用“小鞋子”整人，致使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哪里又谈得上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四人帮”不仅要搞垮工业，搞垮农业，搞垮整

个国民经济，还要搞垮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以达到他们混水摸鱼，乘乱夺权的罪恶目的。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广大知识分子。我们深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广大知识分子一定能够更好地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改造自己，在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斩断“四人帮” 伸向体育战线的黑手

国家体委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对体育阵地早已垂涎三尺。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野心家江青就与林彪狼狈为奸，对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同志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一九七一年，林彪折戟沉沙不久，江青就公然声称她对体育工作已经“进入角色”，把黑手插了进来。

毛主席、党中央从来没有委托过“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人管国家体委的工作。但“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千方百计插手体委，拉山头，搞宗派，分裂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安插亲信，篡夺体委的领导权。江青曾对体委的那个亲信说：“我，洪文，春桥，文元都支持你”，今后把“保密的材料亲自送我”。王洪文更露骨地说：“你以后有事可直接找我，你什么时候来，我都见。”在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私自向体委批文件，送材料，另搞一套。他们一不批林，二不批孔，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并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叫体委的那个亲信“先把物证抓在手上”，“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妄图打倒体委中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江青有

野心之后，江青还跑到体育工作会议上明目张胆地要中央分管体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当“老夫人”，排斥中央对体育工作的领导；而让体委的那个亲信当“红娘”，猖狂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夺权，发泄对毛主席批评的不满。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让人转告“四人帮”在体委的那个亲信，以后不要再去找王洪文、江青了。但体委的那个亲信却写信向江青告密。他们无视毛主席的批评，继续大搞反党的宗派活动。一九七六年初，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体育阵地，他们又挖空心思地提出了一个所谓“体育革命”的口号，鼓噪一时。“四人帮”为什么在这时突然热衷于“体育革命”呢？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让我们看看“四人帮”打着“体育革命”的旗号，究竟干的是什麼。

众所周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人民的体育事业。毛主席为我国体育工作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题写了“新体育”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体育事业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主席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开创人。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体育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伟大方针的鼓舞下，积极锻炼，增强体质，抛掉了帝国主义加在我们头上的“东方病夫”的帽子。我国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刻苦训练，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作出了贡献。体育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体育工作，要一分为二。体育战线上有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正如周总理明确肯定过的那样：总的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既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又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果。但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打出“体育革命”这个旗号时，别有用心地把体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他们胡说什么我国的体育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体育和资本主义体育的本质区别。他们把体育战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而且扬言，除此之外“不能同意其他观点”。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其他观点”，就是指周总理对体育战线的正确估价，公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四人帮”的唆使下，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也跟着叫喊什么搞社会主义体育“现在才开始”，恬不知耻地宣称：要当社会主义体育的“开路先锋”。他还不准人家在报刊上提“过去体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胡说什么谁要提十七年体育战线的成绩是主要的，就是“翻案”。有人提醒他，周总理有过指示，他竟狂叫：“不管他！”短短三个字，就可看出“四人帮”和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仇视。

“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在高喊“体育革命”时，曾经

露骨地说：“体育革命就是解决领导权问题”。真是——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是要在“体育革命”的幌子下，抓体育界的领导权，把体育界变成他们的“帮天下”。

早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王洪文、江青就指使体委的那个亲信“要组织自己的人马”，叫嚷“要提升一批，下去一批，调整一批，调出一批”。对他们的“自己人”，就不顾群众反对，大加重用，安插到要害部门；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同志，则排斥、打击，妄图对干部队伍进行“大换班”。他们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忽儿给这个同志扣上“法西斯”、“林彪线上的人”的大帽子，一棍子打死；一忽儿又说那个同志的“势力太大了”，总之，他们要打倒一大片，只剩下他们自己一小撮。当时中央分管体委运动的华国锋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看透了“四人帮”拉山头、搞宗派的狼子野心，明确指出：要讲政策，要团结和相信干部的大多数，要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治流氓王洪文得知华国锋同志指示后，气急败坏地对他们在体委的那个亲信说：“还是按原来的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小干扰不管，大干扰要顶住。”以后，华国锋同志又与“四人帮”妄图在体委搞大换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肃地指出：搞大换班不行。但是，他们对华国锋同志的严厉批评严加封锁，一直不作传达。在周总理逝世以后和毛主席病重期间，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王洪文将体委的那个亲信叫去面授机宜，让他以搞“体育革命”的调查为名，窜到一些省市，搞反革命串连，搜集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为“四人帮”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提

供“炮弹”，为“四人帮”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嘴里唱着“体育革命”的高调，实际干的是破坏社会主义体育的勾当！他们形而上学猖獗，肆意歪曲和搞乱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们叫嚷什么体育“宁可三年不出成绩，也要把路线搞端正”。他们一手拿帽子，一手拿棍子。你要抓好体育工作，就说你“只有专业的概念，没有专政的概念”；你要为革命创造成绩，就说你是“锦标主义”；你要抓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就说你“只为少数人，不为多数人”；你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就说你是“教练员说了算”。就连要编辑一点外国技术资料，也说你是“宣扬资本主义”。这样，既破坏了提高，又破坏了普及，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体育战线的大好革命形势。

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体育的罪魁祸首。他们搞“体育革命”是假，篡党夺权是真。他们妄图变社会主义体育为资本主义体育，变无产阶级的体育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阵地。体育战线的广大革命群众对此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断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把他们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揪出“四人帮”，体育战士心花放！我们决心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四人帮”批倒批臭，把他们在体育战线的流毒彻底肃清，以战斗迎接我国体育战线的新胜利，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原载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